

■ 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研究述论

庄桂成¹, 舒玲娥²

(1.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2. 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作者简介] 庄桂成(1974-)男, 湖北监利人, 文学博士, 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博士后, 主要从事 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研究; 舒玲娥(1980-)女, 湖北荆州人,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摘要]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有价值的课题。然而, 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 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三个问题, 即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应达到什么目标, 如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有效地进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研究。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发生; 目标; 方法;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5)03-0422-07

中国历史进入 19 与 20 世纪之交, 社会、政治、文化等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同样, 中国文学批评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 也经历着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这个转型重大而且深刻, 它的直接结果便是导致了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任何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者, 都不会且不能漠视它的存在。许多年来, 已有许多学者着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 且出现了许多较有价值的成果。笔者认为, 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 首先还得认真厘清以下几个问题: (1)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 (2)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应达到什么样的预期目标? (3) 如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

一、问题的缘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迟缓甚至误入歧途, 所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许多文学批评研究者就开始思考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建问题。然而, 如何重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总体来看主要有三种意见。

一是恢复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建国之后,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便逐渐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学批评。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 出现了以庸俗的政治批评代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倾向, 到“文革”时发展到极致。因此, 新时期之初, 很多学者便提出了拨乱反正, 要求回到以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轨道上来。例如, 1979 年 3 月, 上海的《戏剧艺术》杂志第 1 期发表了陈恭敏的文章《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首先对流行的“工具论”发难, 在肯定反映论的大前提下批判工具论。紧接着, 《上海文学》月刊 1980 年第 4 期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 直截批评了几十年来中国学界十分流行、无人敢碰、碰则遭难的一个权威观点“文艺从属于政治”, 并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说法, 要求为文艺正

收稿日期: 2005-01-04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研究”(2004036447)

名。后来有学者回顾这次“为文艺正名”的讨论时,认为它基本上是“回到马克思”,“回到一百几十年前马克思当年的理论基点上去”。这对“纠正马克思之后的某些‘走了样’的理论观点非常必要”^[1](第25页)。

1985年前后,刘再复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等系列文章,主张文学研究应以人为中心和目的。他认为,“在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家、描写对象和读者)看作客体,而要更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力量,在文学活动各个环节中,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2](第3页)。当时,许多批评家对文学主体性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陈涌等认为它是“一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的问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文艺学方法论问题》旗帜鲜明地反驳刘再复的观点^[3](第8页)。而杨春时、林兴宅等认为刘再复的文艺理论“不仅没有偏离马克思主义,而且是从整体上把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4](第18页),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1987年,《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组织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题的专栏文章。1990年11月,《文艺研究》编辑部组织召开了旨在“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建设”的座谈会,并于次年该刊第1期刊发了董学文等人的一组文章。90年代之后还有陆贵山、周忠厚、谭好哲等提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二是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为本根来建设中国当代文学批评。1982年10月,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在济南邀请参加《文心雕龙》学术研讨会的部分古代文论研究者,就古代文论研究和建设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进行座谈。“大家一致认为,古代文论研究应该与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联系起来,有的代表(如徐中玉、张文勋)甚至提出,可以用古代文论体系的框架来编写文学概论。”^[5](第100页)会后,《文史哲》发表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座谈纪要)》。后来,古代文论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且研究日趋深入。1984年,南帆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题为《我国古代文论的宏观研究》,文章表达了“古代文论作为一种艺术原理的概括而以其理论威力介入当代文论”的良好愿望,而达成这种愿望的方式则是“我们还必须有意识地开始侧重一种开放性的宏观研究”^[6](第39页)。后来,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的意义问题,学者们又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罗宗强、卢盛江在《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上发表《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认为“对于历史的真切描述本身就是研究的目的”。而《文艺理论研究》于1992年第2期发表申建中的《关于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全面估价》和1994年第2期发表《对改进古代文论研究的一点浅见》,重申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尤其强调要联系今天的实际,主张古为今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学者们开始热烈讨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1996年10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和研究。自此之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深得文艺理论界的热切关注,1997年以来,《文学评论》等多种重要的刊物都特设关于此一问题的专栏。例如,张少康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一文,认为要使当代文艺学走出困境,必须“要在传统文论的基础上发展,要有我们自己的‘话语’,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吸取外来文化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不是用它来取代传统文化”,“必须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为母体和本根,否则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也不可能有新的创造”^[7](第41页)。此外,四川大学曹顺庆等发表系列文章,把中国文论研究中最突出的问题概括为“失语症”,后来又提出了“异质性”等概念。《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发表陈洪等人的笔谈《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学术研究》1999年第1期发表《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九人谈》等等。

三是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学批评来发展中国当代文学批评。20世纪前半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不断吸收和融合西方各种文学批评来发展自己,但共和国成立后,前苏联文学批评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建设的范本,西方文学批评逐渐退出中国文学批评界。20世纪80年代之后,现代西方的各种文学批评在中国轮流登场。而对于如何对待西方文学批评,学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钱中文就曾在陕西师范大学

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上说,西方百年来的文艺思潮、流派更新了我们的知识,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了解到西方文论发展的大趋势。曾经有人大声疾呼,要使文艺理论来一次“西化”,但并不成功。倒是在中西文论融会处,不少同行写出了很多富有首创精神的著作,充分显示了我国文论不同于西方文论的思维特征。但从总体上看,这还只是我国现当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初步交融,虽多有创见,但因缺乏深厚民族文化底蕴,至今未为那些尚未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外国学者所注意,在当今世界上,还听不到我国当代文论的声音。因此,他提出要大力整理与继承古代文论遗产,使其成为一种自成理论形态、具有我国民族独创性的古代文论体系,要站在当代社会历史的高度,将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我国古代文论融入当代文论之中^[8](第 46 页)。

但朱立元先生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在《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 21 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一文中说,当代中国文论界被中国文论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深深困扰着,激起日益浓重的焦虑和危机感,最突出的表现可能是近年来‘失语症’论的提出和由此而展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的大讨论”^[9](第 5 页)。朱立元认为,“失语症”论者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表面看来是反对西方中心论,要想为中国民族文论在世界文论大格局中争一个与西方文论平起平坐的位置,有自己民族的话语和声音。但他认为检验一种理论、学说是否还有活力,是否存在危机的主要标准,不应局限于与其它理论、学说的话语系统或话语方式相比较,而应将其置放于现实语境中,看其是否适合现实的需要,以及适合的程度如何。“失语症”论提出克服“失语”的基本方法是回到百年以前的中国传统去,通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而“这种试图离开现实根基,完全回到古代文论传统的看法,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要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是不可能的”。因此,建设新世纪文论只能立足于现当代文论新传统,而无法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本根,而现当代文论传统本身就是古代文论借鉴、吸收、融合西方文论不断进行现代转换的动态过程。

笔者认为,无论是恢复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还是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为本根来建设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抑或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学批评来发展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它们实际上都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如何发展的一种对策。中国文学批评自 20 世纪初开始,就一直处于艰难的转型之中,因此,目前中国文学批评如何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继续现代转型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大家又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这样,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如回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的原点,也即 20 世纪初的时候,当时的文学批评家是如何做的,他们是如何进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的,或许他们的实践可以为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学批评发展提供启示。

二、研究的目标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我们是为了从中获得启示,寻找规律,从而解决目前纷争的中国文学批评发展问题。这是总目标,但这个总目标的实现,又有赖于各个小问题或者说前期问题的解决。

其一,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所谓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应该说是指中国文学批评中现代性因素的萌生。但是,“现代”是一个意义复杂且难以精确界定的概念(我们所谈的“现代”一般就是指“现代性”)。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在欧洲启蒙大师那里,现代性原本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设计,它严密精致,和谐有序,充满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光辉。至少它是一套有关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理性蓝图。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科技思维与商品经济开始制导艺术领域,日常生活的交流结构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侵害。艺术为抗衡资本主义经济逻辑而走向反叛,并且在文化领域不断引发人们对现代性的抗议与怀疑。因此,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以结构化理论为出发点,将他多年对现代社会的独特的思考成果加以系统化,在对现代性进行常规化分析时溶入了文化和认识论的视角,以简练浓缩的文笔将一幅现代性的总体概貌图景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他认为:“‘现代性’指的是自 17 世纪以来出现于欧洲的社会生

活方式和组织方式,随后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而人们在面对现代性时感受到的种种迷惑,“主要来自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感到被卷入了大量我们没有充分理解的事件,其中的大部分似乎还处于我们的控制之外”^[10](P2)。此外,还有福柯、贝尔等各种有关现代性的学说。后来,我国学者赵一凡对现代性作了这样一个总结:“说它好,因为它是欧洲启蒙学者有关未来社会的一套哲理设计。在此前提下,现代性就是理性,是黑格尔的时代精神,它代表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变革逻辑。说它不好,是由于它不断给我们带来剧变,并把精神焦虑植入人类生活各个层面,包括文学、艺术和理论。在此背景下,现代性就成了‘危机和困惑’的代名词。”^[11](第54页)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的现代性因素,则是我们的发生研究所要达到的第一个目标。

其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是在什么时候。这是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定论的一个问题。西方汉学家玛利安·高利克在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中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开始于1917年1月”^[12](第8页)。许道明虽然在其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中谈到了梁启超和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先导作用,但他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起点,还是放到了1917年。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晚清,例如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等。此外,童庆炳在《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标志与维度》中认为中国文学批评从古典到现代转型的标志是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这两篇文章,饶芃子在《中国文艺批评现代转型的起点——论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及其它》一文中,把王氏的《红楼梦》评论》认作是中国文艺批评现代转型的起点。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换言之,我们或者必须说,每一件事情,包括现代科学最新理论的建立在内,都有一个起源的问题,或者必须说这样一些起源是无限地往回延伸的,因为一些最原始的阶段本身也总是以多少属于机体发生的一些阶段为其先导的,如此等等。”^[13](第17页)他的意思是说,当一定事物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之中时,它往往既是一定过程的结果,又是另一新过程的起点,既是终点,又是开端,既是结果,又是前提。其具体地位取决于人们对它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参照。我们既可以将其作为起点、开端、前提来考察它对新过程的影响和作用,也可以把它作为结果、终点来考察其形成的过程、原因和依据。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就是如此,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的起点,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结束的终点,而这个点究竟应定在什么时候,是我们研究所要达到的第二个目标。

其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为什么会发生。中国文学批评源于春秋时代对《诗经》的评论,发展至今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那么,为什么到了20世纪就开始现代转型,致使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呢?任何事物的发展既有其外在因素,也有其内在规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首先可能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危机有关。晚清时期,清王朝的统治开始衰落,逐渐陷入严重的社会危机。但是,在沉重的社会危机面前,治古文经学的汉学家们却束手无策。乾嘉古文经学没落导致今文经学兴起,而今文经学兴起致使经世致用思潮复活,经世致用思潮要求文学批评的功能发生转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也便由此发生。其次可能是因为西学东渐。晚清西学大量涌入,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危机,儒学正统地位逐渐丧失。而儒学正统地位丧失导致新式教育兴起,新式教育的兴起又为中国培育了大量的新型知识分子。新型知识分子具有不同于以往士大夫的中西学视野和知识结构,他们一旦成为批评主体,必然会导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另外还可能是因为文体变革。中国传统文学的主要文体是诗词,小说却不受文人重视。但晚清之时,小说的地位日益提高。诗话、词话等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文体分析古典诗词的时候,可以说是优游从容,而当长篇小说等结构宏伟的叙事作品出现之后,诗话、词话以及其变体——评点就显得难以为继了。因为评点反映的是评论家在阅读中零星真切的体会和感触,不能做到论文写作的系统性和严密性,缺乏对作品整体艺术境界的领悟和对空灵含蓄韵味的感受,所以中国文学文体的变革也可能促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内外原因的探寻,是我们研究要达到的第三个目标。

其四,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如何发生的。前三个目标的实现为后面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础,即确定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的内涵、时间及原因之后,接下去要解决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的路径是什么。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单向的,一般都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晚清之时哪些学者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他们又是如何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贡献自己的力量?一般来说,梁启超的“三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掀起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的帷幕。紧接着王国维运用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家的理论,写出了《红楼梦》评论》。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学者或流派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做出贡献?章太炎等面对中国文学发展到晚清的困境,提出了文学复古的系列主张。许多人认为“复古即革新”,那么章太炎等人的文学复古是否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的一条路径?另外,梁启超的文学革命和王国维的学习西方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的两条路径,那么,这两条路径又是如何促进中国文学批评中“现代性”因素萌生的?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研究要达到的第四个目标。

其五,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如果梁启超的文学革命、王国维的学习西方和章太炎的文学复古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的三条路径得到确立之后,下面的问题就是他们处于同一时代背景之下,为何做出了各自不同的选择?章太炎是学问家,但同时也是革命家。他是从“排满反清”的民族主义走上革命征途的,他的文学复古观是否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观有所关联?梁启超受西方进化论影响很深,那么,是否因为进化论而促使他一反中国文学史上历来的复古潮流而提倡文学革命?还有,王国维为何会走上学习西方的道路,写出开风气之先的《红楼梦》评论》?这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研究要达到的第五个目标。在上述各个目标完成的基础上,我们最后要达到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研究总结论式的目标:即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当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如何发展争执不下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前人的道路中探寻经验。而这个经验就是暗藏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纷繁复杂的文学批评现象之下的内在规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是由晚清众多学者实践完成的,那么,无论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还是王国维的学习西方,抑或是章太炎的文学复古,其文学批评转型的最终指向是什么。这个内在的、最终指向的探寻,就是该课题研究所要达到的总目标。

三、研究的方法

如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就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应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方法”一词,在我国始于春秋战国时代著名思想家墨子的《天志篇》中,意为度量方形之法。后来,它的含义逐渐演变为解决实践的和理论的问题的手段。在西方,“方法”(method)一词原出于希腊文,系由“沿着”和“道路”复合而成,即“按照某种途径”之意。这个术语在语义上是指有关某些调节原则的说明,这些调节原则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必须遵循的。黑格尔曾将方法比喻为耕地的犁。他说:“手段是一个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犁比由犁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则会消逝并忘却。”可见,方法在某些时候比结论更重要。那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呢?笔者认为,应该是如下两种:

其一,系统论研究方法。方法是客体的对应物,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黑格尔)、“对象的类似物”(恩格斯),因此,“不是方法来框范对象,而是对象决定方法。方法的选择应以是否适应研究对象为基础”^[14](第 38 页)。而文学批评及其对象文学,在整个社会的大系统中,同时代、社会、经济、生活、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等结成了广泛而复杂的关系。“根据系统论的观点,人类社会是一个大系统,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都是属于这个大系统的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下又有若干子系统。文学属于上层建筑这个子系统。在上层建筑这个子系统之中除了文学之外还有哲学、宗教、政治、法律、伦理、道德、艺术等。”^[15](第 11 页)因此,我们研究文学批评的时候,就既要把它放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去考察,又要把它放在与之相关的子系统里去考察,是为系统论研究方法。系统科学是 20 世纪 40 年代崛起的,它的特点在于:“从整体的观念出发,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考察整体中各因素的相互关系,分析整体与

局部、局部与局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认为局部之间的有机联系,局部各自性质和特点都取决于事物的整体系统。”^[16] (第234页)例如,我们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的原因,既要从社会历史角度来思考文学批评与晚清社会危机或文化危机的关系,寻找批评发生的“他律性”规律,也要从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其内部的协调发展要求,考察批评发生的“自律性”规律。这种系统论研究方法要求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研究必须具有宏观视野。

此外,文学批评作为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分类,我们应“立足于文化整体的反思,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道德、法律乃至各种习俗、心理、制度、器用作为一个有机的文化系统加以观照”^[17] (第4页),沟通文学批评与各个社会文化领域间的渠道。因此,黄曼君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建设研讨会”(暨南大学,2000年)上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以及文学的现代化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我们在用现代观点重读和观照的时候,要有客观视野,树立大文学史观,大历史观,大批评史观^[18] (第93页)。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虽然有其独特的轨迹,但它与中国现代文化或思想的发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例如,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所以发生,与文学批评主体的角色变化即从封建士大夫变为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有很大的关系。近现代知识分子具有开放的西学视野,接受了西方的理性思辨思维,接受了西方的某些科学和民主思想,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如果我们不采取系统论的方法分析,就不可能得出客观和全面的结论。

其二,发生学研究方法。所谓发生学的方法也就是从后思索的方法,从后思索首先是从事后开始。马克思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9] (第92页)发生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前提研究和过程研究,它以各种已经形成和相对成熟的东西为起点,去追溯它的孕育、发生和形成过程,对某种结果的产生提供过程性分析,揭示其历史前提和历史依据。在这种意义上,它又是一种前过程研究或逆过程研究。发生学研究的提问方式是,第一,发生了什么?第二,怎么发生的?“对‘发生了什么’的确认实际上是对研究对象的成熟形态的认定,由此也就确定了研究过程的后限。在此基础上考察它是怎样发生的,揭示其形成过程和形成规律。”^[20] (第98页)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研究,就是从目前文学批评的现状和困境出发,去追溯它的孕育、发生和形成的过程。因为历史的发展充满了偶然性,往往是跳跃地、曲折地前进的,从后往前分析的优越性即在于能够使我们避免在对象历史发展过程的旁枝错节上纠缠不清,从而直接考察对象产生的必要条件和前提,在纯粹性上认识对象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因为“凡在过程开始时不是作为过程的前提和条件出现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也不可能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一切作为前提和条件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则必然会出现”^[21] (第262页)。从结果出发,也就必然能够发现对象的真正的发生、发展。

当这一从后往前的追溯完成以后,行程又必须倒转过来,即按照时间顺序将对象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叙述、呈现出来。为什么应该如此呢?因为“一种关系最初出现时的环境,无论如何既没有在纯粹性上,也没有在完整性上向我们表明这种关系”^[21] (第154页)。如果我们试图在一开始就说明事物的本质,那必然是徒劳的,对某一对象的历史的理解,并不就是按照时间顺序直接追寻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实际的过程恰恰是从作为历史结果的现实开始的一个回溯的过程。其实,“纯粹地描述对象发生、发展的实际的历史过程,并不就能达到对其本质的认识,也往往无法揭示其发展的规律。相反,我们倒总是从对象的完成的形态出发,去审视它的发展的历程,从而把握其本质、规律”^[22] (第74页)。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也是如此。百年以来,我们对文学批评转型提出了各种设计方案,20世纪末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谁是谁非我们分辨不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后往前溯或许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研究,是一个重大而有意义的课题。但要想做好这个课题的研究,我们必须事先考虑好我们要完成的目标,考虑好研究它我们所要运用的方法,因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

[参 考 文 献]

- [1] 张婷婷. 中国 20 世纪文艺学学术史: 第 4 部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 [2] 刘再复. 论文学的主体性 [J]. 文学评论, 1985 (6).
- [3] 陈 涌. 文艺学方法论问题 [J]. 红旗, 1986 (8).
- [4] 林兴宅. 我们时代的文艺理论 [J]. 读书, 1986 (12).
- [5] 张海明. 回顾与反思——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6] 南 帆. 我国古代文论的宏观研究 [J]. 上海文学, 1984 (5).
- [7] 张少康. 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 [J]. 文学评论, 1997 (2).
- [8] 屈雅君. 变则通 通则久——“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讨会综述 [J]. 文学评论, 1997 (1).
- [9] 朱立元. 起自己的路——对于迈向 21 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 [J]. 文学评论, 2000 (3).
- [10] GIDDENS Anthony.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 [11] 赵一凡. 现代性 [J]. 外国文学, 2003 (2).
- [12] [斯洛伐克] 玛利安·高利克.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 [13] [瑞士] 皮亚杰. 发生认识论原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14] 林骧华. 文艺新学科新方法手册 [Z].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 [15] 刘安海, 孙文宪. 文学理论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16] 王先霈, 范明华. 文学评论教程 [M]. 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5.
- [17] 陈伯海. 中国文学史之宏观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 [18] 李耿晖. 世纪之交中国文论的回顾与展望——20 世纪中国文论史建设研讨会综述 [J]. 暨南学报, 2001 (1).
- [19]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资本论: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20] 欧阳康. 哲学研究方法论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 [21]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22] 沈 伟. 发生学方法与价值形式的发现 [J]. 常州工业技术学院学报, 1998 (5).

(责任编辑 何坤翁)

Study on Genesi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ZHUANG Gui-cheng, SHU Ling-e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ZHUANG Gui-cheng (1974-), male, Doctor,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a's literary criticism of 20th century; SHU Ling-e (1980-), female, Graduat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bstract: It is important and also valuable to study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genesis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Why we study this problem, what purpose is and how should we carry out the research, which should be first made clear. Only by doing this can we effectively study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genesis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genesis; purpose; method